

定海湾沉船考古的新收获 与宋元明福州港的对日贸易

吴春明

地处闽江口北岸的连江定海素为福州的重要门户,明洪武二十年江夏侯周德兴受命于福建沿海要害处“筑城一十六”,定海即其一;洪武二十一年置福建沿海千户所十二,有定海千户所。^①今定海明城堡遗址石雕门楣上“会城重镇”题刻仍清晰可辨。定海海域地处黄岐半岛与马祖列岛之间,自古就是福州港沿海岸北上和东行日本、朝鲜海上交通的主要通道。但这一带海域浅滩暗礁密布,是沉船事故发水域。70年代末期以来,一批古代的陶瓷、铁、铜器物 and 船壳板等先后被当地渔民打捞出水。以此为线索,1990年、1994年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澳大利亚海洋博物馆等单位合作,先后对这一水域古代沉船的分布进行比较全面的调查和重点试掘,获得一批珍贵的沉船文物。^②笔者拟结合参与这两次田野工作的收获,就宋元明时期福州港对日交通史、贸易史等问题谈点粗浅的认识。

(一)定海沉船文物的内涵

定海村民先后在该海域约40平方公里范围的许多地点捞到古代文物,我们对多个地点进行了水下考古勘察,已经初步揭示出该海域古代沉船的密集分布、船货内涵的部分特点,涉及宋、元、明不同历史时期。

1、白礁一号宋元沉船的内涵

白礁是定海村东北约3500米、黄岐湾水域的一处近岸岛礁,礁体是一座东西向约50米长的孤立岩体,受潮汐涨退的影响,礁体顶部的3—5处高低不等凸起的峰部不同程度地出、没于水面,成为南北航线的危险障碍。分别紧邻白礁东段礁盘南、北面的一号、二号古代沉船,无疑都是触礁沉没的。

一号沉船遗址位于白礁东段礁盘南部海底,在东西长约40米、南北宽约10米的海底表层均有瓷器散布,90T1和95T1—T12的发掘所示的地层叠压关系为:表层,含乱石、贝壳、海泥、青白瓷碗和黑釉瓷盏、零星的晚近青花瓷片;第二层为黑色海泥层,不同程度夹杂青白瓷、黑釉瓷器;第三层为船货层,平面不同位置分别堆积含金属的大型凝结物块、成摞的青白瓷碗和黑釉瓷盏;第四层为船体残迹,发现紧压在船货层下的东西向约10米(限于发掘区位)长的船底龙骨,龙骨上端两缘还残存明显的凹沟状榫槽;以下为海泥层。由此可以判定该遗址是一艘主要运载瓷器和部分金属器具的贸易商船,船载瓷器只有青白碗和黑釉瓷盏两类,具有明显的成

批船货的性质。

该沉船船体除龙骨部分残存外,船壳板几已朽烂无存。但从大型凝结物的底部呈由中间向两侧渐薄的弧形看,船壳沉没后在相当长时间内并没有散架,直至含金属的船货锈蚀、胶结成块后才逐步朽失。因此,可依据凝结物块底部的形态将该船复原为一艘圆底木船。含金属的凝结物、不同类别的陶瓷器相对集中于遗址的不同位置,含金属的凝结物正处于龙骨中段,瓷器集中于东段(应为船首),可见船货分舱堆放的痕迹。从残余龙骨推测该船可达16米以上。

陶瓷器是现有出水文物的大宗,表层调查和局部发掘共获2200余件。其中黑釉盏就有近1800件,这批黑釉盏胎质粗糙,胎色灰白或灰黄;器内及外腹上部施黑褐色釉,部分釉色偏酱黄、青绿,许多釉面不同程度呈现兔毫纹斑,釉层厚薄不均,少数还有失釉现象;制作粗放草率,器型变化不大,多侈口、少量直口和束口,折腹,窄矮圈足,形态大小比较一致,口径约9.5—10.7厘米,高3.7—5.1厘米。其中一件盏的器底露胎处刻划三个“王”字符。青白瓷小碗计300余件,数量仅次于黑釉盏。胎灰白细腻;釉青灰泛白,器内及外腹以上施釉,釉层薄,碗心一道涩圈,少数釉下划花;口径12.7—13.8厘米,高3—4.1厘米;造型差别也不大,尖圆唇敞口或略外翻,浅斜腹微弧,矮圈足斜平。

少量陶罐,素胎或施酱釉。由于初期工作的技术限制,沉船遗址上含金属的大型凝结物块未能得以发掘。表层采集的少量青花瓷片是后期落入的,与一号沉船无关。

黑釉瓷盏是宋元时期建窑系的典型器物,考古调查、发掘的建窑系统古窑址广泛分布于闽江流域、闽南沿海和闽西南的23个县(市)的30余个地点,其中闽江流域及闽东沿海一带就发现有近30个烧造黑釉盏的窑址,重要的如浦城大口窑、半路窑、崇安遇林亭窑、光泽茅店窑、邵武四都窑、建阳中布窑、建瓯白马前窑、渔山窑、南平茶洋窑、闽侯南屿窑、鸿尾窑、福州宦溪窑、福清石坑窑、宁德飞鸾窑、连江浦口窑等。^⑤青白瓷小碗是宋元时期福建仿龙泉窑系的典型产品,从闽北建瓯、建阳、浦城、光泽、连江,到闽南同安、厦门、南安、漳浦等地仿龙泉窑址中,都有类似的青白瓷碗产品。^⑥与白礁一号相似的陶罐在福建沿海各地宋元遗址中也常见,有一种小口深直腹罐在磁灶窑和泉州后渚沉船上都发现过,造型差不多,被认为是盛香药、水银或酒的器具。^⑦这些数量少的器物本身不是船货,可能是船工的生活用具或液态船货的盛器。

残存龙骨板C¹⁴年代测定数字为距今1000±70年,约北宋初年,为木材形成年代。考虑到木材的生长年代和船本身的使用时间等因素,沉船年代应为南宋或至元代,这与陶瓷内涵的时代特点一致。^⑧

2、其它地点的宋元沉船文物

大埕渣位于定海村南面约500米,是尾仔屿岛向东南延伸约200米的一处水下暗滩,在大埕渣浅滩附近曾打捞起大量的青白瓷碗。水下调查表明,大埕渣海底表层散布不少的青白瓷碗,没有找到明确的沉船遗迹,但成批同类型的青白瓷碗具有船货的性质。

龙翁屿是定海村东南海面约2000米的一处东西向的长条形岛礁,礁体两端的礁盘在潮汐涨落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没于水中,成为沉船易发水域,附近分别发现了包括古代瓷器等物的可疑沉船地点。一号地点位于龙翁屿东北端约100米处海底,村民“扒壳”时发现了成堆的黑釉瓷盏和沉船船板遗存,及抗战时期落入的日本炮弹。

两个地点的黑釉盏、青白瓷小碗与白礁一号沉船所出没有多大差别。此外,从定海村民手中收集的文物中有一类深腹青白瓷大碗,灰白胎,釉青黄或青白,器内及腹以上施釉,碗心有一

道涩圈,部分釉下划花;口径多在16—19厘米左右,尖圆唇、斜或弧腹,宽矮圈足;该类器物也是宋元仿龙泉窑的常见器。

3、明代的沉船地点

白礁二号沉船遗址位于白礁东段礁盘北部海底,在约30X30平方米的范围内的海底表层零星散布青花瓷和青瓷类的碗、盘、盆等器计30余件(片)。

主要是青花碗,少量盆残片,胎体灰白,胎质细密,青花灰蓝,釉色灰白。青花瓷碗尖唇、敞口,深斜腹,高圈足直立或外撇,足底平或斜平,腹外部绘莲花纹或团菊图案。盆仅见残片,圆唇外翻,斜沿,深斜腹微弧,底残,腹外绘云雨、山水,沿内绘太阳光芒和飘云图案。此外,定海村民收集的出水器中有书“福”、“寿”等青花单字款的器物。几件青瓷盘,方唇外翻,平沿,浅斜腹,大平底,宽矮圈足,足底斜平,盘内刻划五组波浪形排线纹。未见其它种类器物。

白礁二号地点因未作进一步的试掘,没能确定明确的沉船遗迹,但以上述青花碗为代表的瓷器在胎、釉、造型等方面的特点都很单纯,具有成批船货的特点。这类青花是福建明代晚期的窑址中常见的,^⑤因此白礁二号地点的青花瓷为代表的内涵大致属于明代晚期。

此外,定海海域还有若干地点的水下文物属于明代前后。龙翁屿二号地点位于龙翁屿西端、龙翁屿和龟屿之间的海底浅滩,水下捞起的古代遗物包括“国姓府”铭铁炮、古船板等,可能是一处明末清初的沉船地点。金沙岛位于在定海村东北约10公里处,是黄岐湾东面的金沙岛水域,水下曾捞起宋、明等不同时期的陶瓷器和明铁权等物,估计也含有明代的沉船。上述水下文物地点没有作水下调查,确切的内涵不明,但为进一步的探索提供了难得的线索。

(二)定海沉船在中日交流史上的地位

定海沉船文物、特别是陶瓷器上起宋元,下迄明清,基本上都是闽江流域民窑产品。黑釉器、青瓷器和青花瓷器是历史上我国外销瓷器的大宗,与定海沉船文物的主体——宋元黑釉盏、青瓷碗和明晚期青花碗基本相同者迄今仅见于日本的古代遗址中。

1、宋元沉船文物的性质

福州自古就是闽省沿海主要人文中心和航运中心之一。汉晋间的“东冶”港已是南北间海上交通的枢纽之一,《汉书·郑弘传》说:“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阻,沉溺相系”。唐五代顺势成为海外贸易的大港,称“甘棠”港,据《新五代史·闽世家》,王审知治闽时,“招徕海中蛮夷商贾,海上黄岐,波涛为阻,一夕风雨雷电震击,开以为港,闽人以为审知德政所致,号为甘棠港”;又《琅琊王德政碑》云:“闽越之境,江海通津……号曰黄岐”“赐名其水为甘棠港”。甘棠港的地望曾有争议,但王治闽于福州,而闽省具江海通津之便者福州为最,故王审知不可能舍近求远劈甘棠港于它处,今闽江口北侧的连江有半岛称“黄岐”,对岸马祖列岛有岛名曰“北竿塘”“南竿塘”,与“甘棠”借音,故甘棠港应就是闽国的福州港。据传,渔民曾在定海海域捞到唐、五代的文物,但未得到考古证实。

宋元时期泉州发展超过福州,但福州港的海外交通并未中断。宋代福州太守蔡襄《蔡忠惠公法书·荔枝谱》提到福州:“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元代马可波罗到福州时看到闽江“两岸簇立着庞大、漂亮的建筑物,在这些建筑物前面停泊着大批的船只,满载着商品”“许多商船从印度使达这个港口”。^⑥定海白礁一号等宋元沉船所见的黑釉盏、青白瓷碗等内涵正是

这一时期海交历史的反映。

白礁一号等沉船地点的黑釉盏与典型“建盏”纯黑、兔毫、鹧鸪斑、油滴、曜变等多样富丽凝重的釉色和深腹规范的造型有较大的不同。在闽江流域建窑系诸窑址中,它同闽侯南屿窑、鸿尾窑、福清石坑窑、连江浦口窑所出的“仿建”产品非常相似,有些器物完全一样。^⑧中国历史博物馆曾测得白礁出水黑釉盏与闽北的茶洋窑标本化学成分的关系。^⑨我们反复观察定海的黑釉盏与茶洋窑产品的形态有较大的不同,所以需谨慎对等上述个别标本的测定结果,我们倾向于定海沉船的黑釉瓷盏是闽侯、福清或连江一带窑口的产品。

在福建众多的青白瓷窑址中,白礁一号等沉船地点的青白瓷小碗与连江的已古窑、浦口窑的同类器更相近;从定海村民手中收集的青白大碗与连江魁岐窑、官坂窑等宋元窑址同类碗很相近。^⑩这再次说明了定海湾宋元沉船的主体船货外销瓷器的产地主要是福州港区附近的窑口。

黑釉盏,青瓷和青白瓷碗是宋元时期外销陶瓷的大宗,广见于亚、非各国的考古遗迹中。但综合观察国外所出的同类外销瓷,与定海宋元沉船瓷器可比较者目前仅见于日本福冈县的博多遗址。博多遗址的IV类和V类黑釉碗的胎、釉、造型同定海白礁1号所出的两式黑釉盏间很难找出多大的差别,福冈市教育委员会的森本朝子也认为两类黑釉盏同福清石坑窑和闽侯南屿窑的产品很相似;各式青瓷、青白瓷碗也可不同程度地见于福冈遗迹群。^⑪

所以,宋元时期产自闽江下游一带窑口的“仿建”、“仿龙泉”产品已经成为通过福州港集散,出闽江口经连江定海海域往东、北航线,外销日本的重要商品,成为宋元福州港对日海交的重要物证。

2、明代沉船文物的性质

明初海外贸易形势大变,市舶司严格控制下的“朝贡赏赐”式的交易代替了宋元时期的开放通商。泉州港因此衰弱,成化年间福建市舶司由泉州迁来福州,成为中国通琉球的唯一朝贡港。《明英宗实录·正统四年八月庚申条》曰:“琉球国往来使臣,俱于福州停住。”当时的福州港还是中西海交的基地,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都驻泊福州外港长乐太平港,造船、候风、挑选船员。明代中朝以后,沿海走私贸易飞速发展,中琉朝贡贸易因此衰弱,万历年间明政府撤消了福建市舶司,但福州及各外港的海外贸易、特别是与琉球的交通一直没有中断。今福州仍保留许多明清时期通琉球的遗迹,如水部门外的“柔远驿(即琉球馆)”,河口太保境的“球商会馆”和馆内“道光十九年七月廿六日”的碑文,南效的迎安山、张坑山、白泉庵、鳌头凤岭、东效金鸡山及定海等处的琉球墓群,仅白泉庵一带就有79座,说明福州与琉球关系的密切。^⑫白礁二号等明代沉船文物更丰富了中琉交通史迹的内涵。

白礁二号等沉船地点的青花碗见于浦城的碗窑、崇安的主树垄窑、郭前窑、屏南的前院窑等,^⑬因此其产地仍主要是就近的闽江流域地区。福建明清青花瓷器在国外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并不亚于宋元瓷器,与定海白礁二号地点类似的青花瓷器也见于日本,如在秋田、青森、熊本等县出土的绘菊花、莲花和“福”、“寿”等吉祥文字的青花碗、碟器就是。^⑭据日本《宽永年中崎万国图》载,明代中叶以后瓷器输往日本的港口有南京、福州和漳州,并记1641年7月10日从福州发出的一艘海船载有瓷器二千七百余件。^⑮结合明代福州与琉球海交关系密切的历史,可以说日本出土的许多民窑特点的福建明清青花瓷器的很大部分应是出自福州港。

可见,就现有的资料而言,定海的各类沉船文物反映的主要是中日间繁忙的海交历史。相

反地,福州出港往西、南洋航线的主要通道应为闽江口南侧的长乐海域,有趣的是最近在这一带也发现了古代沉船文物的线索,即将开展的调查、发掘将可以填补福州港航海考古上的一个重要空白。^⑨

注释:

- ①《明史》卷 132《周德兴传》;《明太祖实录》卷 188。
- ②⑥11 中澳合作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定海调查发掘队:《中国福建连江定海 1990 年度调查发掘报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8—19);《福建连江定海沉船遗址 1995 年度调查与发掘》(待刊)。
- ③栗建安:《福建的建窑系黑釉茶碗》,载《唐物天目——福建省建窑出土天目与日本传世天目特别展》,福建省博物馆、日本茶道资料馆 1994 年。
- ④庄为玳:《浙江龙泉与福建的土龙泉》,叶文程等:《福建南部的几处青瓷窑址》,均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 ⑤陈鹏等:《福建晋江磁灶窑址》,《考古》1982 年 5 期;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海洋出版社 1987 年;许清泉:《泉州出土的小口陶瓶年代和用途探讨》,《海交史研究》总第 5 期;叶文程等:《澎湖发现的泉州曾竹山宋元陶瓶》,《福建文博》1990 年增刊。
- ⑦⑩许清泉等:《福建省最近发现的古窑址》,《文物》1959 年 6 期;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印:《福建省古窑址资料汇编》(1959 年油印本);罗立华:《福建青花瓷器的初步研究》,厦门大学 1991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 ⑧曾意丹:《定海海底奥秘——水下考古的探索》,《文物天地》1987 年 4 期。
- ⑨陈开俊等合译:《马可波罗游记》第 191 页,福建科学技术出版 1981 年。
- ⑩《中国福建省出土的天目》图版 92—94,前引《唐物天目》;栗建安等:《连江县的几处古窑址》,《福建文博》1994 年 2 期。
- ⑪宋伯胤:《连江县的两个古瓷窑》,《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 2 期;栗建安等:《连江县的几处古窑址》,《福建文博》1994 年 2 期。
- ⑫森本朝子:《福冈博多遗址群出土的天目瓷》,前引《唐物天目》;池崎让二:《博多出土的贸易陶瓷》,载《中国南海沉船文物为中心的遥远的陶瓷海上之路展》,日本朝日新闻社 1993 年版。
- ⑬朱振声:《福州琉球墓群》,《福州历史与文物》1983 年 1 期;《从福州的几处古迹看古代中琉关系》,《海交史研究》1981 年刊。
- ⑭长谷布乐尔:《日本出土的元明陶瓷》,佐佐林达夫:《日本海的陶瓷贸易》,均见《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等 1983 年印。
- ⑮转引自朱维干:《福建史稿》下册第 88 页,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6 年。
- ⑯福州市考古队文物资料。

作者吴春明: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邮编:361005